

京城艺事



祝兆良 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

祝兆良
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城艺事 / 祝兆良 著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609-9801-5

I. ①京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4583号

京城艺事

祝兆良 著

策划编辑: 李连利

责任编辑: 康 艳 李连利

封面设计: A. Q.

责任校对: 孙 倩

责任监印: 张贵君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5 (010) 64155588

印 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*1230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9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自序

风中的承诺

——演出十二年琐记

夜色阑珊，霓虹灯闪耀。亚运村的一家饭店大厅内，人头攒动，桌上杯盘狼藉，无数人在吞云吐雾，一片香烟缭绕。大厅北侧搭了一座小台，前面放着两个不时嗤嗤作响的麦克风，一位老先生正带着我说相声。虽是吃饭的地方，但一老一少身着长衫在那儿一站，大都觉得很新奇，所以“给耳朵”。

那天我激情澎湃，一段《八扇屏》气口上虽然不准，但当时身体状态不错，倒也酣畅。见“底”了，我心中暗喜，这场活总算圆满。恰在此时，正对着台的头一桌站起了一个人，他瘦得像麻秆，戴着眼镜，嘴角挂着令人恶心的坏笑：“你们这俩孙子先别说了。”他指了指坐在中间的一个人，那人长得臃肿肥硕，留着平头，嘴唇外翻，嘿嘿地笑着，一望便知，是黑道中人。“麻秆”说：“我们老板今天过生日，让你们捡个便宜，说一百句祝寿的话，给你们五百块钱。”周围的七八个人一起鼓掌，冲我们吼道：“妈的，快点！快点！”

老先生侧过头来看着我，表情好像在问“怎么办？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当时的确幼稚，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打架。但对方大约十个人，我知道，这些人几乎每个随身都佩

匕首。当然他们也有所顾忌，动手的时候，大拇哥掐在刀尖往下一寸多的位置，扎在人身横着一豁，能把肉撕开，却不伤里面的内脏。不过，这是在道上混了多年的老流氓才懂的，初入江湖的“生瓜”，根本没有这种“寸量”。

敢陪我打架的伙伴那天都不在，若动手，我一个人是净等着吃亏。当时自己内心的感觉，竟不是恨这些挑事的人，而是恨自己的犹豫、迟疑。我当时真傻，在台上骂了一句“说你姥姥”后，转身就往台下跑，不用回头，听声音就知道那些人扑过来了，同场老先生冲我大喊：“小祝，快关门！”我冲进后台，把门“咔吧”锁上了，紧跟着门外就是凿门、踢门、漫骂的声音，我真是孩子，当时心很慌，从饭馆的后门溜烟儿跑到了大街上。

过了大概一个钟头，才转回来，刚进后台的门，迎面就碰见那位老先生，他狠狠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撸了一把，“小兔崽子，你跑了，把我扔里头了！”我问：“大爷，吃亏了？”老先生抖了抖身上的袍子，“看看，扣儿都扯掉了。”我连忙说：“回头我给您做件新的吧！”他用手拍拍我的脸：“哈哈，当真啦，大爷跟你开玩笑呢！”听他说这话，我心里一阵儿发酸。很多人觉得曲艺圈的人坏，其实大错特错，真正干这一行的人，都是极仗义的。

人品坏的，都是假充内行，是圈外人，但滥竽充数的太多了，真的就变成假的，假的倒叫人以为是真的了。几个后台的阿姨也围过来，嘱咐我：“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多留神！”饭店的老板走进来，大家都不敢说话了。他手里拎着一块挺大的钢板尺，先在桌子上“啪啪”抽了两下，嘴上动了动，听不清说什么，好像是在骂我，然后大吼道：“滚吧，我这儿不用你了！”1998年，那年我十八岁。

有人误以为，我的家境一定不好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才跳进这个火坑。其实，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家里也不在意我往回拿了几个钱，我从小衣食无忧，从未体会过囊中羞涩的感觉。之所以做这一行，纯粹是因为喜欢。至今，对于影响我选择这门艺术的那一段背景我仍然记忆犹新。

十八岁那年夏天，一日天出奇的蓝，我独自一人骑车到了紫竹院，公园外的铁栏杆下有一条小河，两岸是绿草坪的堤坡，一座朱红色的小桥横跨河面。这一片风景，我仿佛在梦里见过。我把车支好，顺着堤坡走到河畔，见碧波荡漾，河面泛起层层的小浪花，我陶醉了，觉得人世间极致的幸福莫过于看着这一番景致。河中有鱼，黑黑的，如梭般穿过。我脑子里想着，怎么才能将它们捉上几条。我侧头向不远处望去，约二十米处，有个老妪望着我。她冲我笑了笑，走向我，说话的声音像眼前的河水，

“你的相貌特别，愿意的话，帮你看看？”我说：“抱歉，没带零钱。”“不要钱。”“……好。”我把脸扭过来，朝向她。她含笑不语，过了片刻，说：“看看你的手。”我递出左手她略一摇头：“右手。”

我换过来，她没用手接，却说：“很软。”我问：“好还是不好？”老妪说：“外表文弱，却爱冒险，这样的脾气，早晚会成就一番事业。”“什么时候能成？”“别急，越晚越好，懒惰些，不过……”我说：“你说吧，我能扛得住。”“你脸色不太好，天生肾气单薄，肝火倒旺。记住，洁身自好，不然，你这一生，成也在女人，败也在女人。”

“多谢您指点。”老妪极自然地问：“现在几点？”我看了看表，“四点半。”她脸上有些着急，“我女儿还在家等我呢，附近怎么没有公交车啊？”这些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，掏出二十块钱给了她，她冲我一竖拇指：“小伙子，你一定能成事，因为

你不在乎钱，记住，要能忍！再见。”她转身往前走，倒背着手，把钱掐在指间，渐渐远去了。这时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。

一个月后，我在街边看到一家洗浴中心招聘演员，壮了壮胆走了进去，有人马上向我鞠躬行礼，一个气质沉静的女人接待我。她的办公室里，光线暗淡。她身穿黑色的套装，不算很漂亮，但一双眼睛摄人心魄，不知是谁的禁脔。呼吸间，有幽兰的香气，她坐在我对面，身体下的沙发吱吱作响。“祝先生，”当时很少有人这样称呼我，她说，“我也很喜欢听评书，每天中午都听。”“噢，你喜欢听谁？”“那个……梅兰芳。”“哦……”我懒得去修正她，此时再看她，已经是个毫无魅力的女人了。

她带着我先在楼里转了一圈儿，有按摩女郎从身边走过，她们把双手搭扣在一起，向我点头行礼，只是双眼无神。我记得有人说，做这种职业先要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，她们不需要所谓的解救，因为喜欢这种麻木的感觉。

一层是浴池，二层是休憩的茶室，三层是桥牌室。当时我觉得这儿很不错，环境优雅，所有工作人员都彬彬有礼。大家都管那个女人叫“刘总”。刘总向我歪歪头，指着茶室内一个小舞台说：“以后你们就在这儿演。”这时我才注意到舞台前面有十几张躺椅，我皱了一下眉，刘总察觉了，“怎么？”她问。“没事，先试试吧。”“记得，明天晚上八点之前来上班啊。”她把公文夹挡到脸上，吃吃地笑了两声。

我问：“笑什么？”“没有，没有，还没听你说呢，光看你，就觉得逗。”多年后，有个朋友向我提起这个女人，“她很讨厌你，说你骨子里有股‘狂劲儿’，背地里常骂你。”我说：

“我算老几？她犯得上在我面前装吗？”“呵呵，她也常说‘天知道哪块云彩有雨’，另外，毕竟你是北京人。”

若现在有人问我该如何创业，我一定会劝他少读书。读书太多的人，一定没手段。这个场所聚集了各种演员，表演流行歌曲、京剧、曲艺、魔术、杂技。演员们见面个个嘻嘻哈哈，背地里却互相骂娘。

若谁在台上演“泥”（术语，演出失败或反响不好）了，马上就有人上报给刘总。有一次她对我说：“在台上放开点儿演。”我知道有人在她那儿“点”了我，我做了些调整，总算挽回了一些局面，才没被开了。并不是为了钱（那时一场挣八十），而是怕自信心受挫。演员赔了钱可以再赚，自信心若伤了，恢复起来可就难了。当时在台上最火的是个唱二人转的演员，大伙儿叫她“胡姐”，四十多岁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。她的头发枯黄，眼下浮肿，脸上、脖子上抹着厚厚的油粉，体形肥胖臃肿，走起路来有些蹒跚。

胡姐说话时声音嘶哑，但不管讲的事情如何令她气愤，却从未听她带过一句脏话，听人说，她原来是上过大学的。每次我走进后台，总会看到她坐在圆凳上，身上汗津津的，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手里拿着一把绣花的小折扇，呼哒呼哒地扇着。看到我，她眯起眼，点头笑笑，说：“来啦？”我对她既无好感，也无恶意，只是觉得她在台上太不拿自己当人了。她唱的二人转不算地道，最拿手的是《十八摸》，但还是有走音的地方，却善于和观众“互动”。

每唱这段，都要叫上几个人联合演出。那些人对她动手动脚，她则故作羞态。台下有人起哄，下流的言辞不堪入耳。为保住“最佳地位”，她想尽一切办法。记得有一次，她叫几个保安搬上来一个长条沙发，对台下的人说：“大家看过台湾的七十二式吗，哪位愿意上来和我一起表演一下？”有不少男人纷纷举手，然后在左侧排成一队，轮番与她“合作”。她是台柱子，刘

总却一直对她不屑。她经常苦巴巴地要和领导说点儿事，可刘总总先伸出胳膊把她挡住，然后捂住鼻子，说：“你就站这里，别离我太近，说吧！”

有一次，她的举动令我惊讶不已。那一天我去得稍早些，门虚掩着，我穿着运动鞋，声音大概很轻，我进门，她没有察觉。只见她双手按住化妆台，身子向前倾着，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镜子，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揪扯着头发，跟着开始抽自己耳光。她大概是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她背后，马上停止了动作。也许是为逃避尴尬，她把长头发拢到了脸前，坐在那里，半天没说话。我懵住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该出去！此时她突然嘿嘿地笑了出来，“被你看到了，小祝，姐不是不要脸，我儿子比你小不了两岁，他要上大学了，家里没钱啊……”她随后便呜呜地哭起来。我说：“哦，我去背背词儿。”

演员里，我那时是最不受观众欢迎的一个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会被安排在整场演出的中间的位置，让观众有方便的时间。

我也并不在意，只当是对自己心智的磨炼，而且的确有效，在台上比从前“稳当”多了。在这一行里，一些膏粱子弟、名门之后，他们去电视台录像，台下配合的是虚拟的掌声，或者到哪个高等学府演一场，不管说得如何，现场一定火爆。但若在无人“保护”的环境下，场下稍有骚动，他们就会六神无主，稍错一句“纲”（话）（术语），就不知道后边如何接了。

他们所缺的是对心灵的蹂躏，有人把你的尊严踩在脚下，你就有机会在羞辱中得到涅槃。古人有句话说得很辨证——人贱才可无畏。那一晚，八点多了，还很冷清，观众席里空无一人，有演员撵掇着干脆去打牌。这时有一位刚刚“出浴”的大人物，据说是什么局的副局长，有人告诉他，二楼还有演出，要不要看。他说当然要看，于是搂着一位女郎窝在躺椅上。刘总说，不能得

罪他，要演。有几个演员轻声嘀咕了几句，然后，一位练杂技的眨了眨三角眼，用手指指我，对刘总说：“让评书先上吧！”刘总看看我，说：“你们演员之间的事，自己决定吧。”于是，我被推上台。这位大人物大概以为演员里会有女色，我一上来，他便有些倒胃，好在怀里搂着一个。以他的权势，这女人应当是他挑的。

要知道，男人的品位有所不同。他搂着的“小心肝儿”，激不起我任何的欲望。那女郎穿着黑色的比基尼，只一侧有吊带，脖子短粗，猩红的嘴唇一直在蠕动着，不知在和副局长说着什么。唯一的亮点是一部肥臀，副局长揉捏着，她则用手拍着客人的肩膀，好像在说：“你真坏，你真坏。”我在台上都替他们不好意思。说了十五分钟，二位可能一句也没听。侧面的楼窗开着，一阵凉风吹过，也许是觉得有点冷，他侧身把头压在女人的胸脯下，口中说“真热乎”。

我心里多少有点来气，说书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大了，这下搅了客人的雅兴，他扭过头来，冲我大吼道：“小点儿声，妈的！”我已不是一年前的我了，这时觉得很轻松，走下台，来到棋牌室，告诉那几个正在用十块钱“豪赌”的演员：“我被哄下来了，你们上吧。”几个人把牌往桌上一扔，低声地骂着我，各自转动心思，要推出下一个倒霉蛋。这时，胡姐一拉我，“走，姐请你吃羊肉串儿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了一声“等我一下”，把湿透的大褂儿脱了，只穿背心，随着她走出后门。门外路边，支着个羊肉串儿摊子，胡姐买了二十串儿，分给我十三串。我说：“姐，买得太多了。”“你还小呢，还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多吃。”胡姐转身，用手扶着膝盖，慢慢坐在台阶上，“小祝，做这一行要厚脸皮，别人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等以后发达了，他们自然就会

来巴结你。我知道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我说：“姐，哪里不一样？”“你肯钻啊，而且你也不笨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“姐，给我提提意见吧。”她扬起头，一边咀嚼，一边在想。

“眼神，眼神不太好，不聚光，要练，每天多盯着一个地方看。”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从小到大老不合群儿的原因，为什么自己总看到人的缺点呢？夜色中，胡姐的眼睛仍旧浑浊，却能“说话”。“还有，声音也不太好，显得不饱满，你身体弱，可以多做得仰卧起坐，跑跑步。”她嘿嘿地笑：“你不要以为我很那个的，其实有些道理我也懂的。”她拍了拍胸口，“我老家在江西，我是老三，我家就我一个闯出来了。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场面也见过一些的，小祝，实话实说，这里算不错哦，我想在这里多干一段。”

她说的是实情，我见到过，在寒风中，立交桥下，十几个北漂艺人在等着，隔一两个小时，会来辆面包车，“穴头”打开车门，高嚷着“要杂技，魔术，再来仨唱歌的，三十，快点儿”。艺人们往车里挤，能上车的不是技艺最高的，而是力气最大的。经常为上车，艺人们大打出手，有人争得头破血流，只为了三十块钱，为了能吃几顿饱饭。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电视上所说的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所谓文艺演出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胡姐说：“做了这么多年了，姐看过的人不少，小祝，你是有天分的。”这时，她把肉吃完了，把晶亮晶亮的签子举过了头，挥了挥，突然提高了几个调门：“小伙子，努力啊！有希望！”数年后，从别人口中得知，胡姐死于胰腺癌，终年五十一岁。那个被她供养上了大学的儿子，一提起母亲，便会暴怒大吼道：“我哪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妈！”

这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母亲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我曾听到过侮辱谩骂，曾见到过冷眼怒目，当我面对邪恶心存恐惧的时候，

当我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开的时候，总会回想起那一幕——凉风习习的夏夜，胡姐坐在台阶上，把晶亮的签子举过头，挥动着，冲我大喊：“小伙子，努力啊！有希望！”

一个月后，刘总找我谈话，她说：“我不是说你的评书讲得不好，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的环境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我懂了。”她把公文夹抱在胸前，仿佛一直在用它保护自己，嘴角挂着微笑。记得那时她常教导我，“你在台上怎么不会笑呢？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。”她当时的笑容，散发出的腥气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“我多给你一次演出费，记住我就是你姐，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。”说话间，她把钱放进我的上衣的口袋。

“谢谢。”我学她的样子，歪歪头，笑了笑，退出屋门，把钱放在地上，说：“刘姐，我走了。”气得她直跺脚。夜市上，人潮汹涌，讨价还价的声音令人烦躁。我觉得，在这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是有所得的。人可以通过看清别人，来了解自己。

此后，我在京城内辗转，不算夸口，所有的专门的曲艺演出场所，我都登过台，那时没拜师，因此，饱受欺凌。后台鱼龙混杂，这里有个怪现象，你越是对人谦和有礼，别人就越敢和你拍桌子瞪眼。终于，我明白，尊重下三滥，就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。我学会了张嘴骂人。有时，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是有效的。和人打架不可动气，气急败坏的情况下，宁可别打。要有心计，与人动手是有目的的。行有行规，下贱之人与世间道德相反，比方说在后台有人拿你的父母开玩笑，你若翻脸，别人还会说你是“空子”。最好的处理方法是走到他面前，盯着他笑笑，叮嘱他“注意安全”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这样，他摸不着你的底，心里就会一直忐忑。我还是认为，人前挑衅，背后总去搬弄是非的人，大多是自认为是内行的外行，他们在台上绝没什么真本事，只好去钻营这些。真正的曲苑中人，深沉儒雅，可与大学教

授比肩。我曾出入于夜总会、娱乐城，演完了，给多少是多少，不给，我拔腿就走，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，真打起来，吃亏的一定是你。但有些场所根本不拿演员当人，我那时狂热地健身，为的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保护自己。

我曾在各种曲艺小剧场待过，对这些剧场也算是颇有心得。若论曲艺的专门剧场，自德云社之前，北京也曾开设过很多，有些能坚持一两年，大部分数月就草草收场。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几点。

1. 院团保守主义。一个团体承包一个剧场，本身就缺乏“叫得硬”的节目，但不希望请外援，因为角儿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

2. 演员流动性过大。曲艺演出需要捧角儿，次次走马换将，观众怎么去捧？

3. 活路太窄。有的人说相声只会三段，他在专业团体，其实是“空子”，更要命的是，不会又不鼓励创新作品。

4. 演员之间互相倾轧，管事的难以协调。

5. 剧场方变本加厉地盘剥。

6. “杵头”（演出费）分配不合理。不管水平如何，所拿的酬金都一样，或论资排辈，青年演员受压制，才华得不到施展。

那时，每到周末下午，我必然要到剧场观摩。我说过，真正的行内人是讲义气的，常常靠他们把我带进去，若没有熟人，则会很狼狈。我也知道，每个园子少人看管的侧门在哪里，有时候，我可以从废弃的下水道钻到后院，再挂着一身脏泥出现在观众席。我和一些门口售票的大姐也认识，在没有领导监督的时候，她们悄悄冲我膘一个眼神儿，我便像条游鱼似的，贴墙溜进包厢。那里价格昂贵，通常是没有人的，演出间隙，她们还会往里给我扔俩橘子。

每看一场高水平的演出，我都像充电一样。优秀的演员会有

一种魅力磁场，他站在台上，观众就会感到滋润身心，作为要当演员的我，则受到他们气质的熏染。在湖广会馆，我曾见识过单弦大家张伯扬的儒雅风度；在北京音乐厅，我为姚雪芬老师情真意切的乐亭大鼓感动得落泪；在前门广德楼，袁阔成先生的神完气足，令我心潮澎湃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这一代的演员，都曾受过一个人的影响，那便是后来威名远震的郭德纲。初见他，是在西琉璃厂的京味茶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原本是个相声爱好者自娱自乐的场所，直到来了郭德纲，才有了大批真正的观众。当时为他捧哏的是王玥波，还有个叫王昊的演员，很有书卷气，后来看不到了。

郭德纲那时二十多岁，梳着三七分，演出的风格和现在大不一样。他是第一个让我乐得肚子疼的演员，但如今，他早已远远地超过了这个阶段，日臻化境。一段相声乐得次数过多是不对的，真正的大师，懂得“笑的生理规律”，当中要让观众有缓冲，并且会考虑整块活的完整性，但他那时的水准，已可让很多主流演员膜拜。真正抖响的包袱，像是在观众席里扔了个炸弹，“嘎”的一声，再四散而开，没抖响的包袱，观众会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，郭德纲没有不响的包袱，但常是两个“嘎，嘎”落在一起。

他打开了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知道在台上还可以如此活络，如此机智，最重要的，他对艺术的热忱感染了所有人。有人说，郭德纲是为钱才说相声的，但若没有对这门艺术融入血骨的爱，他会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十年？你坚持一个让我看看？由于复杂的原因，他后来离开京味茶馆，几年后再见他，是在广德楼。我在后台侧幕看了他一场演出——观众瞧不见他的后背，全是湿的。

在他两脚周围，木质的台板上撒了一圈儿的汗，但他的激

昂，让你相信，那一刻他是幸福的，虽然，观众席里只有十几个人。等到他下场了，我发现，他的气质有了明显的变化。脱下长衫，身上像洗了澡似的。他个子矮小，精神气儿却显得凛然挺拔，令人看着心头一振。男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呢？就是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得大汗淋漓的时候，全世界，都会为他倾倒。

有人觉得，郭德纲身上有“江湖气”，其实，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江湖？那里深藏着一门高深的处世哲学。有位老艺人，在自己食不果腹时，穿得比谁都讲究——几千元笔挺的西装，老人头棕色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，梳着背头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在火穴大赚时，我穿着皱皱巴巴，袖口上还有洞，故意几天不洗脸。业内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意经。但郭德纲无论是穷困之时，还是在成功之日，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我不管别人是不是瞧得起我，我自己尊重我自己”。其实，他身上毛病也挺多，尤其是那一张利口，但我赞同孔庆东老师的话——郭德纲，是个英雄。

很长时间，郭德纲面前如有一座高山，就一个人向上攀爬，周围有无数只脚想把他从半山腰踹下去，他隐忍着，咬着牙，被踹下山底，再重新往上爬。我曾看到过他所受到的排挤、打压，在他未见起色时，不用说权势之人，剧场里的一个电工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刁难他。今天他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

往后的贫寒之家，在教育儿孙时可以说：“咱们家虽然没钱、没权，但不用看着别人眼儿热，人要靠自己，知道吗？以前有个郭德纲，就是靠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的！”这样的教育，是不是比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强呢？

我是一名铁路工人，由我干爹（业余相声演员史书度）的推荐，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曲艺团的一员，时常随团上山下乡。

有一年大年初一到初五，凌晨六点就要爬起来，骑自行车到

东直门公交车站，坐9字头的车奔顺义。车厢里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乘客，往外看，黎明之际，我还挺困的，但不敢睡，否则会感冒。我把脚后跟悬起来，坚持一会儿，增加热血循环，不然脚会冻得很疼。车过了几站，刘捷大哥（侯耀文先生弟子，当时文化宫曲艺团负责人）和李然（今北京电视台主持人）就上来了。我们分配好“场口”（节目顺序），就开始胡聊，李然爱下棋，每次都会带一副吸铁石的袖珍象棋，车上的后半段时间就要和我手谈。我被他赞为“进攻性棋手”，但每次都会输给他，李然帮我总结——“太急躁”。

到了顺义，有当地的车接我们。不单是曲艺，车上还有唱歌、跳舞的演员，车里女演员多，噉噉喳喳像几十窝麻雀。那时一天要去两三个村子，都是在场院里演，之前要想去厕所，往西南方向走，总能找得到。男演员要帮着搭台、拆台、放音箱，这样身子倒能暖和起来。村里的老百姓大多很热情，我们的车临出村时，他们会放两大挂鞭炮欢送我们。我的评书不算火，但我感觉得到，有双眼睛总在看我。

下场了，我常见到一个女孩站在台的右下角，高挑的个子，清瘦的脸颊，尖尖的下巴，穿着长过膝盖的雪白羽绒服，脖子上系着天蓝色的围巾。她眼神清澈，眉梢向上挑着，好像在对我挑衅。我知道，她在专业文工团，是唱民歌的，别人叫她小雯。她一般是最后上，唱《歌唱祖国》《走进新时代》什么的。她是女中音，要是闭着眼听，觉得唱歌的人至少得有四十多岁了。小雯唱歌的时候，身子前倾着，眼睛望着远方，恍如那边有个思念的人。她对所有人都客气，却并不合群，没事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听CD。

有小伙子过来和她搭讪，她微笑着，既热情，又有分寸。那一天，我在台上刚说了半截儿，刮来一阵狂风，我的眼里迷进

了一粒沙子，挺疼，糊里糊涂把词儿说完就下来了。小雯走到我身旁，“迷眼啦？”语气中仿佛有点幸灾乐祸。我用没进沙子的那只眼瞪着她。“来吧。”她推了一下我的胳膊，把我领到休息室，让我坐下，从黑色的双肩背包里拿出一小瓶眼药水，“把头仰起来，对，这种药水是专门冲沙子的……行了，别眨。”我觉得很舒服，倒不是药水的作用，她轻托着我的额头，冰凉的手指在我的脸上划动着，我的体内，激发出一种叫“酶”的物质。这是二十几岁的悸动，以后就没有了。“还有吗？”她问。我转转眼睛，“你原来是大夫吧？”“你真贫！”

我问：“你说话的声音挺高的，不是女中音啊！”她冲我眨眨眼，“我是故意这样唱的，显得自己声音很厚，呵呵，好玩儿吧？”说完，就把嘴闭住，把腮帮子鼓起来。后来我知道，这是她自己发明的一种练气息的方法。我们面对面站着，有点儿尴尬。

“我快要上台了，听我啊！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看她到台下和音响师嘀咕了几句，然后回身向屋里的我挥挥手，前奏一起，竟是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场院里静下来，都直愣愣地看着台上的白衣少女，她蹙眉哀怨地伫立在那儿，只见房上的枯草随着她的歌声，在萧索的风中飘摇。一曲终罢，她鞠躬时，满头秀发从一边倾垂下来，已让我在劫难逃了。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临别时，她说：“记得我啊，再见了别装不认识。”回城了，坐在车上，李然又和我下棋，没三分钟我就输了，他气愤地说：“诚心不好好玩儿吧！”后面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过得挺快乐，一直忙忙碌碌，有时会想起一个人，我会对自己说：“傻小子，她不是你的！”

我每个星期一还是去新街口票房，这一天刚走进院子，那个在梦里常见的身影又出现了。她穿着洁白的羊毛衫，黑色紧身